

QINGNIANXUEZHE



盛邦和著

CONGSHU

内核与外缘
——中日文化论

青年学者丛书

青年学者丛书

内核与外缘 ——中日文化论



学林出版社·盛邦和 著

责任编辑：曹维劲

封面设计：沈蓉男

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

盛邦和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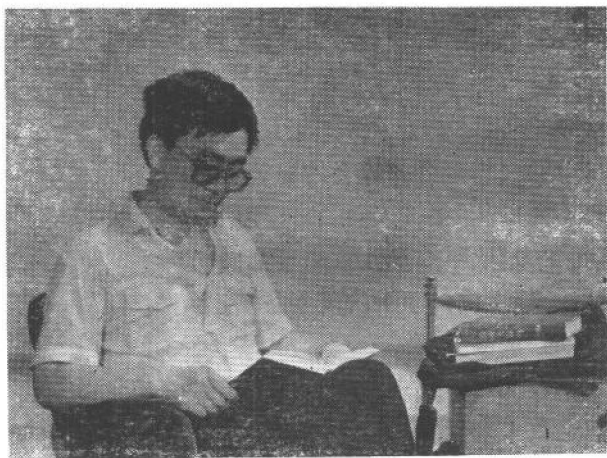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75 插页 4 字数 231,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册

ISBN 7-80510-110-8/G·16 定价(软精装) 5.40元

作者近影



作者简介

盛邦和，1949年生。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副所长。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员。1978年考取华东师大史学所研究生，1981年获史学硕士学位。1982年考取同所博士生，1985年获史学博士学位，近留学日本。数年来发表《黄遵宪史学研究》（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奖）、《黄遵宪与〈日本国志〉》、《近代东方与中国史学发展的东方式道路》、《试论“海派”文化的边缘文化特征》等20余篇学术论文，引起中外学者很大关注和反响。1986年9月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已出版专著《黄遵宪史学研究》，另编史料集《黄遵宪史论集》30万字。目前致力于“东方学”、“中日社会文化比较”及“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

有位未来学者声称，今天社会的显著变化之一是：人类社会已从“年轻人向长者学习”的“后喻”文化，转变为“成年人和儿童主要都向同代人学习”的“同喻”文化；下一阶段将是“长者向年轻人学习”的“前喻”文化。

事实上，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总是互相学习的。如果把这位未来学者的说法绝对化，不免失之偏颇；但他指出年轻人越来越走在前头的趋势，则是很有见地的。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理论界就有一股颇为引人瞩目的“前喻”文化潮流。一批青年学者奋然崛起，以犀利的锐气、独到的见识和严谨的学风，向我们展现了不少令人振奋的新的研究成果。这决不是偶然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形势，为这批新人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壤。

当前，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同时推动着人类知识系统的高度互渗，新领域、新学科、新课题不断地被开拓。面对这新情况，年长

出版前言

CHUBAN
QIANYAN

者和青年人必然地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由于青年人拥有思维结构灵活的优势,因此,可能思想更解放,更勇于探索,他们的研究也就可能更富有生命力,更富于创造性。

面对学术理论界新人辈出的形势,出版工作者有责任把他们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这对于我国学术的繁荣和新人的成长都将是十分有益的。为此,我社决定出版“青年学者丛书”。

出版“青年学者丛书”是个新的尝试。我们渴望这套丛书能获得青年学者们的支持,向我们出示你们的最新、最佳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们也期待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给予热忱的关怀和帮助。毫无疑问,任何新的成果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获得的;任何一个青年学者的成长都有赖于前辈的扶持。

我们和青年学者一起瞻望着中国学术的未来。

学林出版社

序 — XU

中国和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两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门户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之前也大体相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受到西方工业文明激荡的中日两国，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几乎同时迈开了近代化的艰难步伐（中国的“洋务运动”还先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六七年），然而，此后两国在现代化的竞赛中实绩颇相悬殊，日本竟然遥遥领先于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这一十分严峻的事实引起觉醒了的中国人的思考，百余年来，有识之士就此发表过许多分析文字，至今读来，仍能拨动心弦、启发神智。不过，昔人的分析意见大都失之零散，缺乏总体的、系统的把握。近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和国人视野的拓宽，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和研讨，其深度和广度都不可同日而语，这反映了人们希望从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比较中获得启示的愿望愈趋强烈。令人高兴的是，正当此际，盛邦和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一书。该书运用比较的、系统的方法，从文化视角考查了中日两国现代化过程出现巨大差异的复杂原因。

邦和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的中心观点是“内核——外缘”两重构造论。他指出，世界由各个文化区组成，每个文化区又由“内核”与“外缘”组成，而“内核”与“外缘”性质殊异——内核文化是古老的、纯种的、发育完善的、自生根的文化，外缘文化是年轻的、非纯种的、发育不完善的、非自生根的文化；内核文化具有强大的遗传传递力，外缘文化则比较便于嫁接新文化，因而实现文化更新比内核文化轻捷得多。在“中日东亚文化区”内，中国文化属于内核，日本文化属于外缘。由于中日两种文化的这一差异，决定了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经历和结局。邦和还论证，在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化已从“内核”转移到“外缘”，随着“内核”的至尊地位的失落，而有可能获得文化更新的生机，中华文化复兴的希望正寄托于此。

邦和谦逊地称自己上述观点为“假说”。然而，我读罢全书，窃以为“内核——外缘”两重构造论固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论证，需要从诸方面加以完善，但它已经具备一个科学理论的良好框架。运用“内核——外缘”两重构造论可以相当有力地解说包括东亚文化区在内的许多历

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文化区发生、发展、衰落、更新(或灭亡)的历程,可以比较合理地诠释中日现代化进程出现明显差异的原因,因而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不可低估。

邦和同志在其论著中广为吸收了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并加以融铸、再造,这是本书生机勃勃,使人一新耳目的重要原因。邦和构筑理论体系的执著努力,得益于他的开阔的视野和对新知识的广采博取。从事一个特定领域的理论构建工作,固须广泛借鉴各相关学科的研究结论和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在这样做时,又应十分谨慎,尤其是将自然科学的结论和方法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一般应将该自然科学学科的具体研究成果上升到哲学高度(包括方法论高度),只有如此,方具备涵盖社会科学的普遍意义。但邦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相信他今后能够更深刻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使其理论体系更完备、更科学。

今年6月上旬我到上海参加“国际王国维学术讨论会”,初次结识邦和,立即为他的诚挚和好学所感动。邦和嘱我为其论著写序,这也是一种策励。近十天来,我兴味盎然地阅读邦

和的书稿,每每为其雄辩的论证所折服,为其“破译”某些“历史密码”而击节赞叹。无奈我只有一支不灵便的秃笔,记下以上“卑之无甚高论”的话语,权作序言,以谢邦和并待教于读者诸君。

冯天瑜

1987年6月24日于武汉

绪 论

“一个豆荚里的二颗豌豆”。人们时常用它来比喻中国和日本。的确，两国隔水毗邻，“同文同种”，黑发黄肤，又都食稻米，都拿筷子，都会将大豆磨成豆腐，并都使用汉字，在历史上还都信奉儒学。概而言之，实在太像了。然而，这两个国家在近代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前者积弱不振，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者赓赓日进，跻入西方列强的行列。二颗相同的“豌豆”，同样种在东亚的土地上，竟长出不同的枝叶，结出不同的果实。这是为什么呢？

一

为解答这个问题，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潜心研究，提出不少真知灼见。有的从民族精神与国民性视角作出回答。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指出，由于日本领导者“英明睿智”和日本国民的“勤奋与灵活”，遂使他们在“停滞、太平的孤立之梦”被美国佩里舰队打破后，勇敢地建立了“明治伟

业”。^① 王金林著《简明日本古代史》、吕万和撰《简明日本近代史》中说,日本的古代史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民族是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民族。他们积极地把外民族的先进文化吸收过去,加以消化。更由于这种宝贵精神在近代又得到发展,故当海道大通,西方文化东传时,能强学猛进,终于在极短时期内,使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工业大国。二位学者针对日本为什么近代发展较快,还提出了其他许多有益的观点。埃德温·赖肖尔所撰的《日本人》则研究了日本“岛国民族”的“特殊品质”,以及这种品质对近代化的意义。著名日本研究著作《菊与刀》出版后,一直畅销不衰。颇有启迪意义的是,书中通过对日本儒教的剖析,阐述了日本文化在近代化中的作用。这本书的作者鲁斯本·尼迪克特说,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由于日本人对儒学中的“耻”特别敏感,故“深怕含耻受辱”而产生非同一般的“律己”精神,能熬过最困难的时刻,完成本国近代化。许多研究家还强调,日本尤注重“忠”、“信”观念。此类儒学思想在心中根深蒂固,使日本获得莫大的民族凝聚力,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取胜利。日本森岛通夫从更高的理论层次开展对日本民族精神的研究。他的《日本为什么成功》引证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原理指出,“近代化”并不等于一种可以触摸到的物质,如机械、枪炮和舰船,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在西方是更新了的天主教即清教(新教),在日本则是更新了的儒教。他说:“日本的儒教开始时与中国的儒教信奉同样的准则,但是由于对这些准则所作的不同研究和解释,其结果在日本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风行中国的民族精神。”^② 他强调,正如从

①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② (日)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天主教信仰的怀抱中脱离出来的行动都必然导致一场反叛和革命,“日本式儒教”从中国儒教的怀抱中脱离出来,也导致对中国传统农业封建思想的深刻反思与叛离,从而使日本在近代将儒教改造成适合资本主义的“工业精神”,并使日本在较少思想羁绊的情况下,顺理成章地发展资本主义。与日本不同,中国的儒教一成不变地停留在“初始型”的农业文化格局上,故不能成为近代化的“精神促进素”,相反其消极部分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化发展的文化阻力。

笔者的写字桌上放着一本书,时时翻检,获益非浅,这就是日本东京大学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的论著——《日本社会》。此书通过对中日社会结构的比较,提出了著名的日本社会“纵式结构”理论,客观上回答了日本近代发展较快的原因。这个理论指出,日本已转变成为一个“非家族”式的集团社会(区别于家族的超血缘地域与职业集团),当日本历来的血缘家族社会走向消亡时,原有的人际关系格局与习惯力量并不一下子消失,而是介入到社会集团组织中去。因此在日本,无论公司、工厂、军队、学校;无论商界、政界与学术界,人与人都依“纵式结构”与等级差序排列起来,显示出规则的A型构造。这种人群结构有几大特点。其一,具有集权性。每个人群(或称集团)都呈“亲——子”关系。其中“亲”具有至上权威与对所辖人群的“整合力”。处于“子”地位的人,则对“亲”表示绝对的服从。其二,等级性。在纵式结构中“亲——子”关系是多层组合的。故每一层次之间都呈现判然分明的等级差距。其三,依赖性。“亲”对“子”施以“恩”,“子”则报以“义”。中根千枝指出,正是这种“纵式结构”的存在,使日本全民族崇尚“团队”精神,排列成一种特殊的服从指挥、结合紧密的“队形结构”,齐步向近代化目标突进。中根千枝指出,在中国家族结构中,上述纵式结构固然存在,但在中国广泛的超

血缘“职业集团”及其他人群结构中,这种纵式结构形式并没有建立,或达到日本式的典型化。因此,读者体会到的是,中国无法获得这种结构形式给近代化带来的有益促进因素。

如果我们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几十年来不少中日社会史学家还曾经把中国描述成农业家族式、“大陆水利式”的封建专制社会,即典型的“亚细亚”社会。他们指出这种社会结构形式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而迫使近代工业时代姗姗来迟。他们转而论述日本并非典型的“亚细亚型”国家。致使较中国更容易接受资本主义,并于1868年爆发明治维新,走上工业发展的轨道。

除上述之外,有的学者从对照中日两国立国方策入手,也得出许多新鲜的结论。日本森谷正规所撰《日本的技术——以最少的耗费取得最好的成绩》,应用“技术比较论”的方法,研究日本近代经济“起飞”的原因。他试图揭示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明治以来制定了“技术立国”的国策。他指出由于日本在工业化和改进产品能力方面的迅速增长方面已经取得了技术商业化的优越地位,致使日本在国际竞争中获取胜利。美国马宾·吉·沃尔夫(Marvin.j.wolf)在《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中把日本的成功归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与建立所谓“经济集权主义”。他说:与西方不同,日本“在向国外市场进行大规模渗透的背后,则是一个在政府主导下的,称之为经济集权主义再恰当不过的企业活动体制”,这种体制又称作“政企联合体制”。日本的全部经济活动,其实质是,“以设在东京的一座十一层小楼,即通商产业省为司令部而推行的国家阴谋。”^①

最近,在日本产生一种新的“教育经济学”理论,认为:科学

① 马宾·吉·沃尔夫:《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技术,人的受教育程度,生产者的技术能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这些因素被称为“人的能力”,它被“开发”而获得提高并不亚于物质的资本以及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从此理论出发,日本历史学家在回顾既往时,得出一条重要结论:重视人力开发与教育是日本的“立国之本”。日本永井道雄及中国学者李永连在《近代化与教育》、《战后日本的人力开发与教育》等著作中表达了这种观点。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没有注重以小学教育为基础的“全民普及教育”,故没有实现日本式的“人才开发”与达到全民素质提高的目的。这是中国近代化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许多研究家还注意到日本发展不仅有其主观原因,而且还有许多中国及其他国家无法得到的客观原因。日本金泽良雄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日本实际上处于战局之外,成为参战国的市场,并获得了先进参战国的海外市场。以及,由于杜绝进口,给国内工业带来了发展的机会。”^①有的学者在讨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时,提出日本因曾受到以下三点客观有利条件的帮助而导致发展的局面:(1)美国的扶持。美国的战后日本政策始终被以下思想指导着,即“对日占领政策的方向,在于培养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使日本在今后对远东可能产生的新集权主义的威胁发挥防波堤的作用”,^②日本“在亚洲是关键的战略要地”。由于这些政策思想的确定,美国对日本一直采取扶持、援助的方针。这对日本从战争废墟中重新站起来,起有重要作用。(2)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滋养”。这是说在美国侵朝、侵越战争中,日本的工业由于受到美国军事“直接特需”的刺激,获得极大的军需市场,从而扶摇直上。(3)获得东南亚的广阔市场及原料来源地。吉田茂在1962

① 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② 转引《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年出版的《大矶随感》一书中说：“战后，日本丧失了满洲、朝鲜等海外领土、丧失了供给原料的资源。我希望东南亚能够代替满洲、朝鲜等地。”^①确实，由于东南亚市场向日本的开放，使日本经济能不断获取活力，并且不断给矿产贫乏的日本注以“资源血液”。日本都留重人的《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的《战后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等书对此都有详细阐述。

上述种种理论无疑都具有合理的成份。确实，日本民族由于“勤奋与灵活”，由于善于汲取外来优秀文化，由于通过“儒学更新”，使日本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这就使日本在近代迅速获得近代工业化的成功。但是与日本相比，中国同样是勤劳勇敢的优秀民族，为什么日本在近代走到了前面，而中国落后了呢？即以“儒学更新”而言，为什么一百年来，儒学更新能在日本发生，而在儒学的“发源地”——中国却没有迅捷地完成“更新”呢？

就社会结构而言，为什么日本是典型的“纵式结构”社会，而中国则不是？为什么中国是“亚细亚”社会而日本却是“半亚细亚”社会，许多亚洲大陆社会的特点在日本时隐时现、表现不突出呢？

而造成一个国家与民族发展状况的主要是其内在因素，其地理、国际环境的因素也只能是偶然的与外在的因素，并不对日本的经济、社会变迁起决定作用。

二

这一连串的问题启示笔者，造成中日近代发展迅速差异的，

① 引录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经济研究所《战后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5页。

一定还有其更深层隐蔽的原因。然而，这深层隐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人们为此而苦思。理论的产生在于社会对理论的需要。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或现实问题放在人们的面前，令人费解，而且对社会的现实又具有重要意义时，人们对理论的需求便显得分外迫切。因为一个能解答现实问题的理论，是夜海闪电，能以白炽之光划破迷雾，照亮历史的汹涌的洋面；是医生用的解剖刀，银光一闪，骨肉判然，使许多历史之谜解析分明于目前。

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启示笔者把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发展状况作为两个“大文化”体系加以分析评判。由此，笔者冒昧地提出了文化区“内核——外缘”二重构造的假说，认为世界由若干个文化区组成，每个文化区都由“内核”与“外缘”组成，而“内核”与“外缘”性质殊异。又认为中国与日本分别是中日东亚文化区的“内核”与“外缘”，因而造成两国文化传统性质的重大差异，这正是中日两国近代化发展迟速的深层原因。

在设想、构思这个“假说”时，笔者阅读了不少历史、文化、心理、地理、人口、社会等学科的书籍，但结果仍从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中找到明确有力的学说依据，找到了打溅思想火花的宝贵燧石。

笔者首先注意到的是恩格斯关于经济区与经济中心区的论述。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英国伦敦时曾提出：“英国是全世界的商业首都。”^①这表现了如下的含意：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组合成一个偌大的世界性的经济大区，而伦敦已成为这个大经济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3页。